

美籍全球主义者

普拉卡什·洛嘉尼对C. 弗雷德·伯格斯滕的采访

大导演伍迪·艾伦、爵士大师迈尔斯·戴维斯、厨神茱莉亚·查尔德和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之间有何共同点？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再想一想？时间到！答案是他们都是因对全社会和全球作出杰出贡献而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的美国公民。当然，法国人喜欢伍迪，喜欢爵士乐，当然也喜欢美食。但是，伯格斯滕作了什么贡献？甚至你可能要问，伯格斯滕是谁？

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其他得主们往往周游世界，而伯格斯滕一生中的工作主要是在环绕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高速公路——“首都环线”（Beltway）内开展的。1981年，伯格斯滕在此创办了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经济学研究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并一直担任该研究所的负责人。此前他曾在美国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最初是在尼克松政府下由亨利·基辛格率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任职。基辛格

称，伯格斯滕向他传授了“有关经济学的所有知识”。此后，在能源危机的动荡时期，伯格斯滕成为美国财政部顶级国际经济学家，为卡特总统充当幕僚。最近，他公开宣布将在2012年底不再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职务。

伯格斯滕一生致力于将全球化思维注入眼界狭隘的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之中，并致力于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这些成就为他在海外赢得了诸多荣誉，如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等。他曾是欧元的坚定支持者，还强烈批评说人民币被低估，因为在他看来，人民币低估将引发贸易保护主义，并破坏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在1991—2001年期间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并在此后担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迈克尔·穆沙将伯格斯滕比作“开放经济的传播者”。

出生于福音传道士之家

从伯格斯滕出生在一个传道士之家来看，人们很难预料到他后来会从事开放经济学。伯格斯滕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阿米蒂维尔（Amityville，很多美国人通过风靡一时的《阿米蒂维尔鬼屋》（Amityville Horror）一书和电影了解到了这一地区），此后迁至密苏里州法明顿市（Farmington），伯格斯滕说，这个地方“就像其地名（farm是农场的意思）一样，位于一个基本上是农村的地区”。在这两个地方，与学习相比，篮球运动占据了年轻的伯格斯滕的头脑。迄今为止，伯格斯滕仍然积极参加这项运动。

伯格斯滕的个人经历几乎全部都发生在美国，这如何造就了他对国际事务的喜爱？伯格斯滕将之归结于小时候的一次英国之旅。1951年夏天，当时年仅10岁的伯格斯滕与父母一同来到了英国。他的父亲是一位卫理公会牧师，参与了教会的全球牧师交换项目，此次是作为交换牧师到英国传道。“那时的伦敦由于遭到轰炸，很多人无家可归，”伯格斯滕说。对于他们这样的外籍家庭，是无法获得食物配给的。“这样，我就到了一个



完全陌生的环境中，也体会到了战争带来的后果……我认为，正是这段经历使我真正走上了那条道路。”

伯格斯滕在父母曾经就读的位于美国密苏里州费耶特的中央卫理公会大学完成了大学学业。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对“政治学、历史学和辩论以及一切和政治相关的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年夏天，他跟随大学组织的参观团来到了奥地利和德国。在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的轮船上，他注意到每天都会有人在甲板上举办有关国际事务的研讨会。伯格斯滕说，他“可以说是悄悄地靠近了过去”。

研讨会的组织者正是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参议员J.威廉·富布莱特的参谋长赛斯·提尔曼。提尔曼鼓励伯格斯滕到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研究生，培养对国际事务的兴趣。提尔曼本人“也是弗莱彻学院的毕业生……在他的帮助下，我被该学院录取，从此真正步入了该领域”。

与基辛格的“冷战”

1968年，27岁的伯格斯滕从弗莱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被基辛格招致麾下，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事务助手。这个职位在伯格斯滕看来，如同“教皇的军事顾问”。“冷战”不断升级，基辛格完全专注于宏观对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但对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则鲜有兴趣。伯格斯滕说，基辛格告诉他：“弗雷德，我要你以我的名义完成所有的事情，不要来烦我。”

伯格斯滕说，这种安排方式最初很有效，但是“后来，有很多事情我必须要有他的帮助，而他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根本无法完成我的工作”。于是，在1971年年中，伯格斯滕向基辛格请辞，他对基辛格说：“你似乎不需要，或者配不上我提供给你的优质咨询服务。”1973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专稿，指出“亨利·基辛格在经济问题上的业绩令人失望”，“超级明星单打独斗，是不可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

伯格斯滕说，他“那时候明显（对基辛格）有些生气”。后来，他和基辛格终于言归于好。伯格斯滕说，他从基辛格那里收到一张带有基辛格签名的照片，上面写着“致弗雷德：我所有有关经济学的知识都拜你所赐”。在一次活动中，基辛格在介绍伯格斯滕时风趣地说：“（在离开我后，）弗雷德在卡特政府中取得了极其杰出的成就，这一成就（在我那里）是很难取得的。”

应对各种紧要问题

1976年11月，卡特在当选美国总统后，马上召集伯格斯滕到佐治亚州向他汇报所有的国际经济问题。伯格斯滕负责处理过渡时期的所有国际经济问题，并

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有关国际经济问题的最高负责人。

在新当选的卡特总统看来，解决由于世界原油价格飙升导致的危机问题是当务之急。1977年4月，在担任美国总统一职四个月后，卡特穿着一件毛衣，坐在炉火旁，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讲话，展示美国人应该如何降低对国外进口原油的依赖性。他在讲话中宣称，战胜能源危机“从道义上讲，相当于战胜战争”。

迈克尔·穆沙将伯格斯滕比作“开放经济的传播者”。

这对伯格斯滕来说也不啻于一场“战争”，不过他早已作好了准备。早在1962年夏天，伯格斯滕就曾在埃索国际石油公司（此后成为埃克森石油公司）工作过。如同其他石油公司一样，埃索公司过去通常在一个地方生产原油，然后将之运至通常很远的其他地方的炼油厂进行加工。伯格斯滕认为，显而易见，如果某家公司可以安排与另外一家公司交换原油的交付，每家公司都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将原油运往更远地区炼油厂的运输成本，从而节省大量费用。

找到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解决方案的任务落到了当时年仅21岁的伯格斯滕身上。“于是，我就想，如果我们埃索公司从壳牌石油公司获得其来自委内瑞拉的部分原油，将之运输至我们位于距离委内瑞拉很近的库拉索炼油厂，另一方面将我们在中东地区生产的部分原油给壳牌公司，并送至其位于非洲的炼油厂，我们两家公司都可以节省下大量的费用，两家公司都能从中受益。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1967年，当为期六天的中东战争爆发后，伯格斯滕的经验正好派上用场。伯格斯滕说，当时美国国务院“非常担心石油的获取情况，事实上确实如此。我们根本不知道石油何去何从”。伯格斯滕说，他能查明这一情况。通过他此前与埃索石油公司和其他石油公司的关系，伯格斯滕帮助美国国务院收集到了相关数据，“该数据也成为了此后建立的防卫机制的一部分”。

伯格斯滕对能源问题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兴趣，并“或多或少预测到了‘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崛起）”。1970—1971年期间，伊朗国王和刚刚接管利比亚的卡扎菲“不断推高石油价格，都想打败对方，结果导致世界原油价格大幅上涨”。伯格斯滕说，他“能够看到未来的走向”。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两个，多个欧佩克”（One, Two, Many OPECs）的著名文章。在文中，他预测欧佩克将取得成功，并警告其他一次性资源产品也将形成卡特尔联盟。

一方面，欧佩克如伯格斯滕所预料的取得了成功，但伯格斯滕针对其他卡特尔联盟正在形成的警告在很

大程度上并未最终兑现。公平地说，这在部分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警告以及欧佩克的成功引起了资源进口国决策者的警觉，使其采取行动极力防止其他卡特联盟的形成。穆沙在《弗雷德·伯格斯滕与世界经济》中写道，伯格斯滕是一位“乐观的灾难预言家”，一方面，他有“预测经济灾难的癖好”，另一方面，他“总是对未来保持基本乐观的观点”，认为通过建设性的政策举措可以避免那些最坏的结果。

伯格斯滕在能源问题上的丰富经验及其认为政策举措可以发挥影响的观点，对于卡特总统来说尤其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此后伯格斯滕也因此荣获美国财政部“杰出服务奖”。不过，伯格斯滕说，即便没有能源危机，这也会是“各种国际经济问题爆发的热点时期”。（有关伯格斯滕在美国财政部所取得成就的更多信息，见专栏1。）

智库生涯

伯格斯滕对美国政府所作的贡献已足以确保他获得某些长期的声誉，不过伯格斯滕在这以后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地位。1981年，在美国公共政策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下，他组建了一家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在智库领域，伯格斯滕并不陌生：他曾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政府服务部门以及布鲁克林研究所工作过多年。

此后，国际经济研究所更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其部分原因是为了感谢创办该研究所的董事长彼得·G.彼得森提供的资助。英国记者马丁·沃克将该研究所称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该研究所一经创办即取得成功，此后成就源源不断。1987年通过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采纳了关于汇率目标区的概念，该概念便来自于由伯格斯滕以及彼得森研究所的学者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建议。当时，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理查德·达尔曼指出，协议中使用了“参考汇率”一词，使汇率目标区建议中的债务问题的关注度显著降低。

多年来，在量化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代价以及提倡为受到贸易保护主义不利影响的各方提供援助方面，彼得森研究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99年，彼得森研究所的加里·哈夫保尔指出，美国参议院计划通过的钢铁进口限额法案所保留的就业岗位不到3000个，而每个岗位给纳税人带来的成本却达到80万美元。伯格斯滕说：“那天，每个参议员手上都拿着（我们的）那份分析报告……当天出版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议题。最终该法案遭到了否决。这是智库的成果应用于某个具体政策问题的典型案例。我们在早期就开展了基本的分析工作，并不断完善，将分析结果应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并且将分析报告送至决策者的手中。”三年之

后，该研究所有关贸易调整援助计划的成本估算，对于确保一项恢复美国总统贸易“快速审批权”的法律得到通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说，很少有政府部门以外的哪个机构能像彼得森研究所一样对美国政府的全球经济观点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作为一名美国人和世界公民，我觉得我们很幸运”拥有彼得森研究所，萨默斯如此写道。

欧元的积极支持者

欧元的采用，是世界货币发展史上一件非凡的事件。不过，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对欧元能否取得成功持怀疑态度。很多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基于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该理论认为，统一货币只有在特定条件普及的前提下才能取得成功，这些条件包括工人可以在采纳统一货币的不同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并且建立一个可以将资金从表现较好的经济体转移至表现相对较差的经济体的体系。那些采用欧元的国家缺乏上述条件，使得很多美国经济学家预测，欧盟这一经济联盟将会最终陷入泥潭。比如，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199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指出“希望管理一个货币联盟以及随后发展一个政治联盟……可能导致欧洲内部以及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加剧”。

专栏1

保持贸易的再平衡，1977年和2007年

1977年，当卡特的经济团队上任时，采纳能源计划是其“第一要务”，通过降低经常项目余额的规模保持全球需求的再平衡则是其次的任务。事实上，即便能源计划的目标也是通过减少石油进口量来降低美国贸易经常项目的赤字。

当时，英国也处于经常项目赤字状况。在从福特政府向卡特政府过渡期间，英国人游说伯格斯滕，希望减少此前IMF支持的计划中所达成的公共支出削减幅度，削减公共支出被作为降低英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措施之一。凯瑟琳·波尔卡和艾里克·凯恩克罗斯在其《再见，大不列颠：1976年IMF危机》一书中写道：“在两个多小时内，（英国代表）哈罗德·莱沃极力想说服伯格斯滕，卡特政府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减轻福特政府时期的财政压力。伯格斯滕的答复是‘不’。”

同时，伯格斯滕还反复劝说日本和德国两个拥有大量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希望两国刺激其国内经济的发展，以防其货币的被迫升值。30年后，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问题再次成为政府的首要议程。2007年，IMF牵头负责通过“多边协商”机制让多个经济体，包括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就减小其经常项目余额的政策举措达成协议。

不过，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对此持相反意见。其中一位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看似不可思议的是，蒙代尔也是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创立者。他认为，货币联盟将导致经济联盟的形成；也就是说，采用欧元将创造那些有助于最优货币区域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条件。另一位欧元的积极支持者就是伯格斯滕。不过他说，他的立场来自于“政治经济视角”，而非最优货币区域视角。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期间，伯格斯滕与欧洲决策者积极沟通，他坚信，欧洲决策者最终将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不断推动一体化进程”。

“除非美中两国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所有经济问题很难取得重大进展。”

欧洲最近的危机并未改变伯格斯滕的看法。欧洲决策者“在危机的每个阶段都已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避免出现崩溃”。伯格斯滕说，“德国将付出其必须付出的代价”来拯救欧元，这是因为德国在欧洲一体化中拥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同时欧元也促进了德国贸易的发展。他预言，欧洲正缓步走向“全面的经济联盟。五年之后……他们将实现这一目标”。

20国集团和两国集团

除欧元区以外，伯格斯滕发现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诸如20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集团（20国集团）这样的论坛是“绝对必要的，有众多合理的理由支持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新兴市场目前占据全球经济的一半，“它们是最有活力的组成部分。你不可能仅仅由七国或八国集团（仅代表最大的发达经济体）来管理整个世界”。2008—2009年期间的“大衰退”进一步加快了“20国集团”地位合理化的进程。“不能再犹豫不定了，”伯格斯滕说，“必须将所有适宜的人集中在一起来控制危机。”

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伯格斯滕同样提倡建立“两国集团”，即由美国和中国组成的一个隐性集团。伯格斯滕说，他的建议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论点，即除非美中两国达成一致意见，否则所有经济问题很难取得重大进展”。他指出，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以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就是由于美中两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从而阻碍了其他更多国家的谈判进展。他还指出两国在汇率问题上僵持不下的局面：“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而中国则一直设置障碍”（见专栏2）。

彼得森研究所的学者兰德尔·亨宁说，伯格斯滕

专栏2

中国及“自行车理论”

彼得森研究所的学者以其独立见解而闻名。不过，他们对有关中国汇率的观点则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人民币汇率被人为低估——比应该达到的水平低20%—30%，这意味着对中国出口商品提供补贴和对美国及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伯格斯滕在去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稿中写道。他说，美国应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诉讼，控告中国“参与非法竞争性货币贬值活动，如果中国不停止此类贸易保护性政策，美国将采取报复性措施”。

伯格斯滕的强硬观点部分反映了他著名的“自行车理论”——他认为，如同自行车一样，贸易自由化必须保持部分向前的动力，否则就会开始回转至贸易保护主义。伯格斯滕写道，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种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形式”，是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威胁：“美国或其他国家针对中国行动的对策（应）被视为反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

提倡建立多个国际论坛的前提条件是“各国政府在国际经济关系——公共利益——中的合作长期不足。主要的问题不是过多论坛的建立会引起机制上的‘意大利面碗效应’，而是不能充分利用这些论坛的问题”。

“一系列五十周年庆典”

伯格斯滕现年70岁，他将迎来一生中众多的周年庆典。他热衷于庆祝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使他能够与那些影响他一生的人和组织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去年，他组织了中央卫理公会大学同班的50周年同学会。今年，他将负责组织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研究生班的50周年同学会，以及他的50周年结婚纪念日。“对我来说，这是一系列的50周年庆典，”伯格斯滕说。

至今，伯格斯滕仍然活跃于政界和篮球场。他定期主持在彼得森研究所内、以他名字命名的大型会议室中举办的很多“特邀”活动。穆沙曾经开玩笑说，尽管“鉴于弗雷德父母的身份，有些人可能认为（会议室）看上去像一个现代化的教堂，但我认为它像一座篮球场。弗雷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篮球迷”。事实上，伯格斯滕至今仍在一个篮球俱乐部打球，每场比赛平均得分达到38分，这一成绩在同样也是篮球爱好者、现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伯格斯滕承认，这个分数是有些高，其原因在于“这个俱乐部是一种带有娱乐性质的俱乐部，不过你仍然必须将球投入篮网中”。■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顾问。